

范仲淹评传 (下)

方健 著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匡亚明 主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范仲淹评传/方健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4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匡亚明主编)

ISBN 978-7-305-05940-7

I. 范… II. 方… III. 范仲淹(989~1052)—评传
IV. K827=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6358 号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典藏版)

范仲淹评传

方 健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210093)

安徽省儒林图书有限公司 发行

网址:www.rulin.com.cn

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开本 660×960 1/16 印张 34.25 字数 370 千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5940-7

定价:67.00 元(上、下)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名誉顾问 陆定一 谷 牧 李铁映 陈焕友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 王霞林

组 员 任彦申 王斌泰 石启忠 韩星臣
洪银兴 冯致光

学术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光训	丁莹如	王元化	王朝闻
冯友兰	曲钦岳	任继愈	刘导生
刘海粟	安子介	孙家正	
杜维明(美国)	杨向奎	苏步青	
李 侃	吴 泽	何东昌	张岱年
陈 沂	罗竹风	赵朴初	施觉怀
钱临照	徐福基	袁相碗	
席 文(美国)	唐敖庆	黄辛白	
蒋迪安	程千帆	谭其骧	滕 藤
戴安邦	魏荣爵		

主 编 匡亚明

终审小组 茅家琦 周勋初 林德宏

副 主 编 (按姓氏笔画为序)

卞孝萱	任天石	巩本栋	茅家琦
周勋初	林德宏	洪绛平	

第四章 宋学开山

在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的历史长河中,出现过三座巍巍高峰:一为先秦诸子百家,二是宋学的兴盛,三乃清末民初的大师辈出。迄今为止,海内外学术界普遍将第二个学术高峰界定为宋明理学或新儒学,笔者以为这种提法未免有失偏颇。

一、宋学概论

与汉学相对立而异军突起的宋学,有其十分鲜明的特点,一是疑古,不守汉唐经传旧注训诂之说,致力于义理的阐释;二是追求明体达用,经世致用,外王内圣的统一;三是具有“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①的博大精深,融儒释道于一

^① 《礼记·中庸》第二十七章,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5页。

炉。宋学,究其滥觞,实始于韩愈。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论:韩愈乃“开启宋代新儒家治经之途径者也”;奠定“后来赵宋新儒学新古文之文化运动”基础。^①但若论宋学之开山祖师则非范仲淹莫属。这种观点已始见于朱熹,其《朱子语类》卷一二九有云:

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

前汉末,极有名节人。光武却极崇儒,重道尊经术,后世以为法。……如范文正公作《子陵祠堂记》云:“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胡文定父子极喜此语。大抵前辈议论粗而大,今日议论细而小。

朱熹将范仲淹置于宋初三先生,北宋五子之首,指出其创导名教之说,^②阐述光武“崇儒重道尊经术”的微言大义,尤为功德无量。可惜这后一点被历来的学者所忽略,于是,在全祖望的眼里,仲淹的学术建树仅为“高平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③。钱穆先生对范仲淹的学术地位

① 《金明馆丛稿初编·论韩愈》第288页。

② 《范集》卷八《桐庐严先生祠堂记》又云:“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于名教也。”

③ 《宋元学案》卷首《序录》第1页,观同书卷三《高平学案》第3页。



有高度评价,其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上》说:

自朝廷之有高平,学校之有安定,而宋学规模遂建。后人以濂溪为宋学开山,或乃上推之于陈抟,皆非渊源之真也。

同书又称:“言宋学之兴,必推本于安定、泰山,盖至是而师道立,学者兴,乃为宋学先河。”钱先生同书还说:“安定、泰山、徂徕三人,既先后游希文门”,是指宋初三先生以范为师门,其说尚矣。钱先生力斥周敦颐(1017~1073)为宋学开山(实乃理学创始),其论尤精。^①但也首肯《宋元学案》编者“首安定,次泰山、高平,又次庐陵”的序次,认为“盖得之矣”^②,则似未免有失公允,又与上论自相抵牾,颇失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旨。钱先生将“宋学精神”归纳为“革新政令”,“创通经义”两端,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讲学)”^③。姑且不论这种对宋学精神的概括是否确切,就这三端而论,范仲淹的领袖地位也是毋庸置疑的。他的历史功绩不仅在于政事革新,即使是“创通经术”和“书院讲学”也开风气之先,不失为一代宗师的学术地位。范仲淹不仅有天圣年间守丧时主持睢阳学舍的教育实践,也有判国子监(太学前身)的宦历,其教学思想和实践尤足称许。宋初三先生对范仲淹的推崇备至,不仅在人品政绩,也

① 邓广铭先生在《关于周敦颐的师承和传授》中更加申论,称周在“其时的儒家学派当中,是根本不曾占有什么地位的”。参见《邓广铭治史丛稿》第193~21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②③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4、7页,同书第5页又云:“北宋学术,不外经术、政事两端”,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在经术学问,孙复《寄范天章书》(二)可为代表:

后之作疏者无所发明,但委曲踵于旧之注说而已。复不佞,游于执事之墙藩者有年矣!执事病注说之乱六经,六经之未明,复亦闻之矣。^①

他指出了仲淹宗经但不守旧注的学术新路子。

朱熹也早就指出:“文正公门下多延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与公从游。”^②需要补充的是:仲淹身后先后主盟北宋文坛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等人,北宋五子之一的张载等,无不从学于范,撇开论资排辈,单就开学术风气之先及荐拔人才而论,范仲淹的宋学开山地位也是当之无愧的。他的另一位高足张方平说出了当时士林对范高山仰止的一致推崇,他说:

始者,学士执亲之丧于南都,暇日以道义教徒于乡之庠,诱人乐善,孜孜不足。

经术兴于南郡,士林归乎北海,慕仰高义,心用激发。^③

无论是经术还是教学,天圣八年(1030)通判河中府任上的范仲淹,已如东汉末名士孔融(人称孔北海)一样,享有时望和重名。

① 《宋文选》卷九,《孙明复小集》卷二。

② 《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一一。

③ 《乐全集》卷三一《上河中同理范学士书》,《全宋文》卷八〇四第337页。



理学,作为宋学的一个流派兴起于北宋。代表人物为北宋五子。^①南宋朱熹继承发展了二程学说,并汲取了周、张、邵学说的部分内容,加以综合,熔铸成庞大的体系,建立起理学中居主流地位的学派。与此同时,有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别派与之对峙抗衡,但影响不如朱学。宋末朱学取得正宗地位,成为官方哲学。元代理学北传,影响广泛,明代仍以程朱理学为正统官学。陈献章由宗朱而转陆,王阳明鼓吹心学,逐渐形成理学中另一主流地位的学派。清初理学极盛而衰,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朴学取而代之,成为学术主流。理学从产生到式微,经历了约七个世纪。

理学以古代儒学为正宗,融会佛老,探讨了宇宙本原及认识真理的方法和途径;也探索了世界规律与人类本性等哲学问题,涉及政治、道德、伦理、宗教、美学等许多领域及自然科学的若干领域,不失为比较完整的哲学体系。理学,继承和改造了许多旧有的哲学范畴和命题,也开拓和提出了不少新的哲学范畴和命题。虽有烦琐芜杂的弊病,却有精密细致的长处,所谓“牛毛茧丝,无不辨析”^②。在我国哲学发展史上,有重要建树,其思想影响,超过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南北朝、隋唐佛学等,也有广泛的国际影响。遗憾的是过去被误认为宋学的全部,海外又称之为新儒学。即使仅就理学而言,也是流派纷呈,如以地望分,有濂洛关闽之别;如以治学路子分,又有

^① 北宋五子,作为中国哲学史上常识性的约定俗成,指周敦颐、张载、二程、邵雍。但陈荣照博士却误以为“有宋五子”,谓指濂洛关闽学的首创者,周、二程、张、朱。见其《论范仲淹在宋代文化史上的地位》(刊台大《论文集》第784页)。北宋五子,乃朱熹首创之说,不包括他本人,显而易见。

^② 《明儒学案·凡例》。



义理、象数、史事之别；就哲学流派而言，则又有朴素唯物论与客观、主观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两军对垒。

北宋时期，理学之外，还有欧阳修、三刘、李觏为代表的江西学派，足以与理学相颉颃的王安石荆公新学，三苏的蜀学，刘摯(1030~1097)、梁焘(1034~1097)的朔学等新旧学的对垒，蜀、洛、朔学的异趣构成了北宋学术史的异彩纷呈。不同学派却对高平范学有一致的推崇，绝非偶然。在南宋初，也有浙东学派与理学、湖湘学的并存。总之，宋学的丰富多彩、博大精深，足以令古往今来的学者心醉神迷。正如陈寅恪先生总结的那样：“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①陈先生更对新宋学之建立寄以厚望。^②

关于宋学的基本特征，陈植锷遗著《北宋文化史论》总结为六点，颇具识力。今撮其要并加申论如下：

其一，议论精神。此为宋学第一要义，是宋代知识分子独立人格，自主思想，言论自由，批判精神的真切反映，这与宽松的时代环境，不无关系。宋代台谏固然可“风闻言事”，一般臣僚也能知无不言。宋儒的议论有强烈责任感和针对性，直言极谏，不避权势；抨击时弊，不遗余力。其代表人物范仲淹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自白；^③欧阳修则有“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的豪迈。^④故朱熹亟称：“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叶适也说：“欧氏为本朝议论之宗”。^⑤皆得其实。

① 《寒柳堂集·赠蒋秉南序》第16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② 《金明馆丛稿二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第245~246页。

③ 《范集》卷一《灵乌赋》。

④ 《欧集·居士集》卷二《镇阳读书》。

⑤ 《朱子语类》卷一二九第3089页，《习学纪言序目》卷三九第585页。



其二,疑古精神。孙复、胡瑗、李觏、欧阳修、刘敞(1019~1068)堪称典型,他们均受到范仲淹不同程度的影响。如北宋的《易》学研究,李觏的经世致用和三先生的心性之说,殊途同归于义理派。尽管学术思路不同,抛开旧注却毫无二致,以忧患意识作为共同的思想基础。

其三,创造和开拓精神。断以己意,作新斯人。有所发明,十人十义,言人人殊,是宋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氛围和万千气象得以形成的根本原因。与汉学墨守成规,拘泥师说,皓首穷经,轻信寡疑,因循守旧,形成了鲜明对照。

其四,经世致用精神。学术研究为现实政治服务,不脱离实际,体现时代精神,力求解决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如李觏和石介的易学研究,即着重说明拨乱反正,化无序为有序,变冲突为和谐,革故而鼎新。范仲淹的《四德说》也赋予元、亨、利、贞以新解,着重说明:行此四德,才能强国惠民,兼济天下。又如孙复则以《周易》为体,《春秋》为用,其《春秋尊王发微》也充溢着时代精神,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其五,内求反省精神。指宋儒以心性义理探索内心世界,加强自我修养功夫,以完善人格,服务于社会。用张载标榜的名言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达到“内圣外王之道”^①的理想境界。

其六,兼容并蓄精神。有容乃大,宋学的“致广大而尽精微”,不仅指将释道整合于儒学之中,也指宋学不同乃至对立的学术流派的兼容包涵。求同存异,相对立而并存,既有学术观点的交锋、渗透、融合,也有治学方法的互相影响和取长补短

^① 《宋元学案》卷一七《横渠学案》上,《庄子·天下篇》。



短,宋学实在是开放型而毫不保守的学术流派,故能永葆青春,产生历久而弥远的影响。^①

宋儒治学风气大变,刻意创新,致力于探索以义理解经,开创新的研究领域,提出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新观点、新见解,推动了学术思想文化的发展。宋人的渊博和扎实令人叹为观止。其治学方法,借用陈寅恪先生的话来说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评态度”^②。这也是宋学最本质的特征。

今人常说的精神文明,在宋代,大致包括二方面内容,一是科学技术,在当时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毕生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李约瑟博士对宋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倾倒备至,他在其巨著中写道:

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考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焦点就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③

二是学术思想文化,也达到当时的最高水平,甚至超过了汉学。最早提出这一看法的是宋代的理学大师朱熹,他说:“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④近代的两位学术大师所见略同,王国维先生指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⑤陈寅恪先生也称:“华夏

① 参见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论》第287~323页,中国社科出版社1992年版。

② 转引自汪荣祖《陈寅恪评传》第246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③ 《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卷一第287页,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

④ 《楚辞集注》第30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⑤ 《王国维遗书》册五《静安文集续编·宋代之金石学》,上海书店1983年版。



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① 毕生研治宋史的著名史学家邓广铭先生更是指出: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②

就物质文明而言,未必尽然;但就精神文明而言,确实如此。这里,我们不妨考察一下宋学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繁荣兴旺的原因。

首先,是北宋统治者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推行“以文德致治”^③的既定国策。宋初右文崇儒的国策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宋代的知识分子堪称生逢其时。宋时,“方时厌乱,人思复常,故士贵。盖不待其名实加于上,下见其物色士类而意已悦安之,此儒之效也”。^④ 北宋立国以来,一反唐代重门阀、讲出身、排资历的风气,大开孤寒入仕之路,剥夺门阀世族把持仕途的特权,表现在科举制度中便是“家不尚谱牒,身不重乡贯,以此得人”^⑤。宋代极重进士科,《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二之八~九载:“国朝以文章取士,莫盛于进士一科,名公巨卿,项背相望”。这正是宋代的实际情况,进士科得人之

① 《金明馆丛稿二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第245页。

② 邓广铭《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刊《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

③ 《宋朝事实·圣学》卷三第37页,丛书集成本。

④ 《鸡肋集》卷三四《张穆之〈触鳞集〉序》第233页,四部丛刊缩印本。

⑤ 《止斋文集》卷三五《答林宗简》第184页,四部丛刊缩印本。



盛,进士高科升迁之快,都为历朝所罕见。此外,通过制科选拔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通过馆阁储备和考察人才;通过历宦州郡、遍历中外的实践培养和使用人才,均有独到之处,两府大臣多由其途而产生。如北宋的杜衍、范仲淹、欧阳修等均出身寒素,起家孤贫,通过这一途径而致身通显,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在庆历、嘉祐之际形成了一个灿若群星,人才辈出如云蒸霞蔚般极为可喜的局面。叶适曾总结过宋代知识分子成长的必由之路:

必养之儒馆,必任之金粟,必居之谏诤,审谏刑狱,习知边事。一人之身,内外之官无不遍历,较之以资,取之以望,然后其大者为政事之臣,而其小者亦为侍从之官。其人既已周旋众职,详练世事,虽不必真能尽知,而皆习闻其大概。名为蕴藉温雅,沈厚老成,以局度器识自许,而上亦护养爱惜,不使有以少损其名。^①

考察范仲淹的生平行实,正经历了这样一个遍历中外,亲民巡边,馆阁谏职的过程,取得各方面的知识和才干,方被识拔为执政,因而能比较称职地干出一番大事业。这对于今之人才选拔、培养、使用、考察,不无启迪意义。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宋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中,多蕴涵着爱国热情、忧患意识、积极的人生追求和社会责任感,富有时代风采和审美情趣,尽管有时其政治观念扞格相违,对改革也未必政见一致,

^① 《叶适集·水心别集》卷三《进卷·官法上》第666~667页。



但以天下为己任,成为宋代知识分子的共同信念和追求。

其次,宋代士大夫享有中国古代最大程度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发表议论,讽谏朝政,更不用说自由地进行学术研究,著书立说了。陈寅恪先生曾说过:“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①允为的评。元代旷世大典《元典章》中曾写进了严惩“妄撰词曲,犯上恶言”的法律条文,对文学创作明文下达了禁令;由农民起义胜利而建立的明朝及满族入主中原的清朝,更是动辄大兴“文字狱”,不仅对知识分子思想言论自由剥夺殆尽,对异端知识分子更滥施廷杖、残杀等穷凶极恶肉体消灭政策。最能体现宋代知识分子思想和言论自由的,莫过于台谏制度。所谓台谏,乃台官与谏官的合称,本来台官职司监察,谏官重在言责,有明确分工,宋代台、谏职能趋向合流,故常以台谏合称。北宋对台谏官的遴选十分重视,有一套完备顺序,实亦祖宗家法内容之一。正如周必大所说:“祖宗故事,明降指挥,令翰林学士、给、舍或侍从之贤及台、谏之长各荐数人,然后就其中选择用之。”^②

北宋台谏官堪称权重事专,就监察范围而言极为广泛,上至皇帝贵戚、执政大臣,下至诸司百官,从中央到地方的州县官吏均在其职权范畴和监察视野之内。另一重要职能为上疏论奏国事,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们只要翻检一下赵汝愚编的《宋朝诸臣奏议》一五〇卷,就会感受到北宋台谏论事的范围,简直无微不至,无处不在,无奇不有。《宋会要辑稿·职官》一

① 《寒柳堂集·论再生缘》第6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② 《文忠集》卷一五二《台谏员数回奏》,四库影印本第1148册第671页。



七之一六恰当地概括了台谏官的职责：

谏官职在拾遗补缺，凡朝政缺失，悉许论奏。则自宰臣至百官，自三省至百司，任非其人，事有失当，皆得课正。台官职在绳愆纠谬，凡官司稽违，悉许弹奏。则宰臣至百官，自三省至百司，不循法守，有罪当劾，皆得纠正。

“许风闻言事”，赋予台谏官独立行使监察权的最大权力，使其可将弹劾职能发挥至淋漓尽致。许风闻言事原则，早在晋宋时就已形成，不过，那时还仅限于御史台。^① 苏轼论宋代台谏制度最为透辟：

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②

其三，宋代文明的高度发达，还仰赖于两大因素，一是教

① 《容斋四笔》卷一一《御史风闻》第747页；谏官专职，始于南朝萧梁，见王夫之《宋论》卷四第89页。

② 《苏轼文集·上神宗皇帝书》卷二五第740页。



育的普及,二是作为文化载体书籍的广泛流传。北宋教育呈现官学、私学、书院办学齐头并进的兴旺景象,州县官学景祐已形成小高潮,至庆历形成兴学热潮。书院办学有一流学者执教,又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优越的条件,独特的教学方法,很高的成材率,足以与官学相抗衡。如果说学校是宋代学术文化酝酿、滋萌、传播、发展的重要基地的话,那末,科举考试就是左右其价值取向,发展方向的座标。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以其人格力量、道德伦理、学说著作言传身教,奠定了宋代学术兼容并蓄的万千气象。

其四,宋儒治学路子很宽,由博返约,不主一家。清人翁方纲(1738~1818)曾评论说:“宋人之学,全在研理日精,观书日富,因而论事日密。”^①出于对宋儒有偏见的清儒之口,此论尤为公允而可贵。如王安石,学问渊博,出入百家,故能成为独领风骚的大家,他的求学之道却很通达:“善学者读其书,唯理以求,有合吾心者,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②这代表了宋人治学的一大特点,唯真理是从,有实事求是之意而从不盲目崇拜名人、权威。另一位北宋颇有名望的学者黄裳(1043~1129)总结他的治学之道说:

尝谓道家之徒蔽于说气,儒家之徒蔽于说理,释氏之徒蔽于说性。……予之为书,泛观而旁采,有可述者,皆其是非有理,取舍有义,本于自然之道。^③

① 《石洲诗话》卷四,丛书集成本。

② 《冷斋夜话》卷六,丛书集成本。

③ 《演山集》卷三五《书自然子书后》,四库全书本。



儒家以忠孝为伦理核心,以经世致用为立身之本,常走外王内圣的修养之路,先天不足是缺乏关于价值本原的理论思考。佛道两教就正在形而上的哲学思辨领域对儒学提出挑战,与韩愈禁佛排道,振兴孔孟主张不同,宋儒则多取出入佛老,取其精髓加以改造的融合之路,达到“修其本以胜之”的目的。宋儒也借助、吸取佛道两教的精华以升华儒学的纲常伦理道德,使之更具思辨和哲理性。即使如欧阳修、石介排斥佛教甚力,但他们反对的是佞佛和崇奉释氏,反对大兴土木,广建寺院,剃度僧众。他们本人却对佛学有很深的修养和造诣,对佛学并不排斥和反对,欧阳修还与不少高僧颇有交往。

宋学不仅对古代社会也对近代产生了弥久而深远的影响。正如近代思想家严复(1854~1921)所总结的那样:

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于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①

二、范仲淹学术思想初探

范仲淹不以皓首穷经的思想家著称,可能是他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掩盖了其学术建树。他的坎坷经历,勤于治政,

^① 《严复集》第三册《与熊纯如书》(第52函),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68页。此函始刊于《学衡杂志》第13期。

